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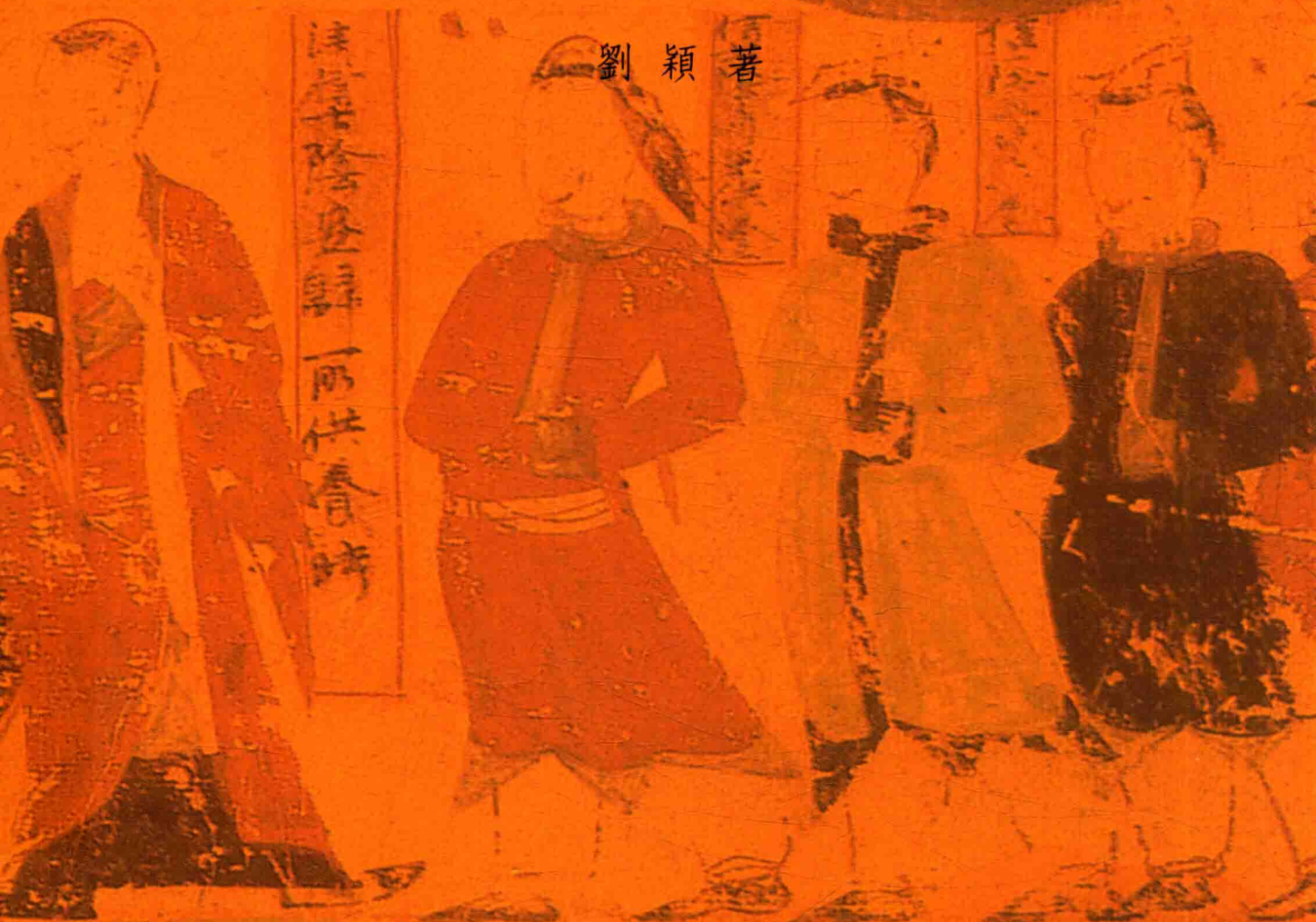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第三十冊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劉穎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王明蓀主編

第30冊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劉穎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劉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序 6+ 目 2+164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30 冊)

ISBN 978-986-404-970-7 (精裝)

1. 佛教藝術 2. 吐蕃

618

106001495

ISBN-978-986-404-970-7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三十冊

ISBN：978-986-404-970-7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作 者 劉 穎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28032 字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 (精裝) 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劉 穎 著

作者簡介

劉穎，1972年出生於四川省資中縣。1995畢業於四川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2002年考入四川大學藝術學院研究中國美術史，2005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07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師從羅世平教授，研究中國宗教美術，201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成都大學美術與影視學院。近年出版譯著牛津藝術史叢書之《中國藝術》和著作《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高昌壁畫卷》，發表《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密教菩薩經變研究》、《莫高窟吐蕃後期的報恩經變及其信仰》、《莫高窟吐蕃時期的維摩變及其信仰》、《張大千敦煌畫稿與敦煌壁畫的比較研究》等數篇論文。

提 要

本書在多次考察敦煌莫高窟吐蕃時期的石窟寺和壁畫的基礎上形成。公元786至848年間，敦煌淪落為吐蕃的屬地，在吐蕃人的統治下，敦煌進入到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815年赤祖德贊登上贊普位，他主張與唐通好，扶持佛教。821年唐蕃盟會之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唐蕃之間保持著友好往來的關係。吐蕃統治者與唐王朝交好的行為給敦煌也帶來了影響，在莫高窟的造像活動中有突出表現，在石窟形制、壁畫構成形式、壁畫題材等方面形成吐蕃時期獨特的樣式和風格。本書以821年為界，將吐蕃統治時期營建的洞窟分為前後兩期，重點討論821～848年的石窟藝術。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分析敦煌莫高窟吐蕃窟的窟龕形制、壁畫構成形式和題材特徵，從其演變、發展的情況以及壁畫的細部特徵進行了考證，劃分出821年以後興建的吐蕃後期洞窟22個。821和822年唐蕃政權在長安城外和拉薩舉行會盟，蕃漢民族關係進入相對融洽的時期，致使以漢傳佛教藝術為主導的吐蕃後期洞窟壁畫中，出現了新的繪畫因素。第二章至第六章專注於研究吐蕃後期具有突出時代特徵的經變畫，以密教菩薩經變、金剛經變、報恩經變、維摩詰經變等題材為主，探討密教菩薩經變圖像樣式，金剛經變脅侍菩薩新樣式的來源，吐蕃時期的密教菩薩信仰特點，以及經變中的故事畫及其體現的信仰思想。

從洞窟的整體設計原則分析，吐蕃統治後期，石窟內壁畫題材的配置形成較為固定的模式，淨土類經變是最常見的題材，與其它經變題材一起，營造出想像中的佛國淨土世界。從信仰思想方面來看，建造石窟的供養人將為唐蕃雙方祈福、祈盼唐蕃通好、避免征戰之苦、免除親人分離之痛等世俗的現實願望隱含在壁畫中。

序 言

一、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

公元 7 世紀，「性驍武，多英略」〔註 1〕的松贊干布統一了青藏高原諸部，曾經默默無聞的高原民族開始進入到有聲有色的歷史時期。755 年赤松德贊登上王位，吐蕃王國隨之進入鼎盛時期。赤松德贊是吐蕃人眼裏智慧謀略超群的贊普，他向東對唐朝進行有計劃的軍事行動，向西對中亞展開了侵略活動。8 世紀後半葉，吐蕃趁唐朝安史之亂無暇顧及之機，向中亞展開了異常的侵略活動，不僅控制了整個天山南路地區，而且「控制了東部的河西到羅布地區和西部的帕米爾地區，是相當穩定的。吐蕃不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成爲交流東西南北物資的中心和成爲融合文化的中心，因而其本身也得到發展、對周圍產生很大影響，從而在世界歷史上做出極大貢獻的時期，也正是這個時期。」〔註 2〕在此期間，吐蕃佔領了以敦煌爲中心的唐朝河、隴地區，從此「蕃斷漢消息，死生長別離」。〔註 3〕

786 至 848 年間，敦煌淪落爲吐蕃的屬地，在吐蕃人的統治下，敦煌進入到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變化。

〔註 4〕吐蕃的部落制代替了唐朝時期的鄉里制，敦煌的經濟一度退回到物物

〔註 1〕《舊唐書·吐蕃傳》，卷 196 上。

〔註 2〕（日）森安孝夫著，勞江譯：《吐蕃在中亞的活動》，載《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1 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30 頁。

〔註 3〕（唐）張籍：《沒蕃故人》，范學宗，王純潔編：《全唐文全唐詩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47 頁。

〔註 4〕關於吐蕃攻陷敦煌（沙洲）的時間問題，各家主張不同，主要有大曆十二年

交換的地步。吐蕃統治者又以開闊的胸懷接納了敦煌盛行的佛教信仰，接管了這個有數百年信仰歷史的佛教中心。敦煌地區的佛教石窟造像得以繼續發展，吐蕃統治下的六十餘年時間裏，鳴沙山斷崖上不間斷地補繪和新建的石窟造像就是最好的證明。到目前為止，莫高窟依然保存著吐蕃時期補繪和新建的洞窟數十個，它們是研究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藝術最直接的實物資料。

二、莫高窟吐蕃後期洞窟年代的界定

本文擬以 821 年，即「長慶會盟」年代為界，將吐蕃統治時期營建的洞窟分為前後兩期，把研究的重點集中在 821~848 年的石窟造像藝術上。以 821 年為界，把吐蕃時期修建、圖繪的洞窟分為前後兩期的理由如下：

（一）「長慶會盟」前後敦煌社會進入相對安定階段

815 年，赤祖德贊即位，他主張與唐通好。至 9 世紀 20 年代，吐蕃統治敦煌已有 30 餘年，他們在敦煌地區先後創建了數個軍事部落，把敦煌的漢人與其它民族納入到軍事組織當中，敦煌百姓的地位與初期相比有所提高。「敦煌漢人經過初期的數次反抗鬥爭失敗後，已進入相對安定的階段」。吐蕃統治者「為維繫『西裔一方，大蕃為主』的局面，他們急於與唐朝訂立盟約，以換取自己佔有河隴的承認。」〔註 5〕長慶元年（821）和長慶二年（822）唐蕃使者先後在西安郊外和拉薩大昭寺前盟會，這就是唐蕃交往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長慶會盟」，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唐蕃之間平息了戰爭，恢復了友好往來關係，給吐蕃統治下的敦煌也帶來了影響。為了安撫民心，恢復當地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吐蕃統治者在當地採取了一系列減免稅賦、添置農具、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農業經濟得以持續發展。

（二）世家大族勢力崛起

拉攏漢族世家大族和唐朝破落的官員是吐蕃統治政策變化的又一項內容，而世家大族和寺院高僧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勢力增長是開窟造像必要的條

（777）、建中二年（781）、貞元元年（785）、貞元二年（786）、貞元三年（787）及貞元四年（788）等六種說法。本文取貞元二年（786）說，參見陳國燦：《唐代吐蕃陷落沙洲城的時間問題》，載《敦煌學輯刊》1985 年第 1 期；金澄坤：《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綜述》，載《絲綢之路》1997 年第 1 期。

〔註 5〕楊銘著：《吐蕃統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第 69 頁。

件。「敦煌大族是在敦煌這塊特定的土地上產生的地方大族，他們自漢代以來，世代宦官，歷久不衰，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長時期地壟斷了敦煌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並對河西地區的歷史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註 6〕}在吐蕃統治時期也不例外。爲了平息敦煌地區此起彼伏的抵抗運動，吐蕃統治者讓唐朝的破落官、漢族世家大族成員參與到政權的管理中。吐蕃後期，漢人擔任了更多的管理職務。敦煌文書 P.T.1089《吐蕃管理呈請狀》是書寫於 9 世紀 20 至 30 年代的一份蕃、漢官吏文書，其中記錄了漢人擔任的官吏職位。^{〔註 7〕}儘管漢人官吏的地位仍然不高，但卻證明了漢人參與管理的事實。入仕吐蕃、參與政權管理的敦煌大族中，陰氏家族最具有代表性，陰伯倫任「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註 8〕}其次子陰嘉義爲大蕃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三子陰嘉珍爲大蕃瓜州節度行軍並沙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

世家大族的崛起還表現在僧界，吐蕃政權也熱心於爭取沙州的佛教界人士。統治初期，一些有聲望的人士不肯與吐蕃統治者合作，紛紛剃度爲僧，他們這種保存自我的行爲促成了吐蕃統治後期由世家大族把持僧界權力的局面。例如，索氏家族的索義辯曾任「沙州釋門法律」的顯赫職位，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贊並序》記載的即爲其人；^{〔註 9〕}出自沙州汜氏的汜和尚被稱爲「沙州釋門都法律大德」，P.4660《都法律汜和尚邈寫真贊》中有記載；^{〔註 10〕}吳洪辯在 820 年開始擔任敦煌僧團都法律兼副教授，在 830 年前後擔任了敦煌地區最高僧官都教授等等。在吐蕃統治者的庇護下，世家大族、漢族官吏、寺院不斷地佔有和兼併土地，經濟勢力也得到加強，使得他們成爲推動吐蕃後期莫高窟石窟建造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長慶會盟」後佛事活動興盛

8 世紀末到 9 世紀中葉，佛教勢力在吐蕃本土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尤其

〔註 6〕 劉志安：《唐朝吐蕃時期佔領沙洲時期的敦煌大族》，載《中國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83 頁。

〔註 7〕 參見《P.T.1089〈吐蕃管理呈請狀〉研究》，載楊銘著：《吐蕃統治敦煌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註 8〕 P.4640《陰處士碑》，載鄭炳林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34 頁。

〔註 9〕 鄭炳林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08～109 頁。

〔註 10〕 鄭炳林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09 頁。

是赤德松贊和赤祖德贊在贊普位的幾十年裏，修建寺廟、翻譯經典、優待僧人、讓僧人參與國政等等措施使得佛教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勢力都變得強大起來。〔註 11〕赤祖德贊還舉行興佛盟誓大會，設置了尊為「鉢闍布」（意為「大吉祥」）的僧相職位，地位高過吐蕃大相。興佛活動在吐蕃全境內傳播，也波及到原本就是佛教信仰勝地的敦煌，直接觸動了莫高窟造像活動的再度興盛。從吐蕃時期的敦煌文書研究中得知，「從赤祖德贊時開始，沙州的寺院、僧尼數有迅速發展。」〔註 12〕而且當時的寫經事業就足以證明佛事活動興盛的狀況，上至贊普、王妃、吐蕃國政蕃僧，下至世俗百姓都參與到其中。P.3336「丑年、寅年，贊普新加福田，轉大般若經，分諸寺維那曆」和 S.3966「壬寅年，大蕃國有贊普印信，並此十善經本，傳流諸州，流行誦讀」是吐蕃贊普直接介入河西吐蕃佛教事務的記載。P.T.997 藏文寫卷記載，敦煌保存的數百卷《大乘無量壽經》是由赤祖德贊出資抄寫的。〔註 13〕

（四）吐蕃時期的造像活動明顯有前後期的變化

吐蕃佔領敦煌時期，莫高窟佛教造像活動與當時敦煌的社會狀況息息相關。自 764 年開始，涼州、甘州、肅州等地相繼被吐蕃攻陷，唐蕃之間紛亂戰爭的影響已經蔓延至沙州。776 年吐蕃攻陷瓜州，在此之後的十年裏，沙州直接陷入了與吐蕃的戰亂。受到戰爭的影響，莫高窟的造像活動一度處於停滯狀態，在南區南段底層和第二層都留下了盛唐時期開鑿、卻未能圖繪完工的洞窟。沙州陷於吐蕃統治之後，莫高窟恢復了造窟活動，開始造像的確切年代不得而知。從整體情況看，造像活動明顯有前後期的變化。吐蕃統治前期，開窟造像仍然處於低谷狀態，以新建小型洞窟為主。吐蕃統治後期，除了繼續補繪盛唐洞窟之外，莫高窟開始新建大中型洞窟，世家大族、高僧大德都積極參與到造窟活動當中。在此階段裏，石窟形制、壁畫構成形式、題材等等方面都形成了吐蕃時期獨特的樣式和風格。

〔註 11〕 赤德松贊 798~815 年在位，赤祖德贊 815~836 年在位，參見王輔仁編著《西藏佛教史略》附錄《吐蕃贊普世襲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註 12〕 （日）山口瑞鳳：《敦煌的歷史·吐蕃統治時期》，載楊銘著：《吐蕃統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附錄，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78 頁。張延清：《敦煌藏文寫經生結構分析》，載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 年。

〔註 13〕 參見陳慶英：《從敦煌藏文 P.T.999 號寫卷看吐蕃史的幾個問題》，載金雅聲、東錫紅、才讓主編：《敦煌古藏文文獻論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綜上所述，821年唐蕃「長慶會盟」以後，吐蕃在敦煌地區的統治政策趨於緩和，敦煌百姓盡力適應著吐蕃人的統治，蕃漢民族之間的矛盾減弱了許多，經濟生產逐漸恢復。吐蕃贊普的興佛活動，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在僧界擔任高職的漢族僧人，這些條件都為吐蕃統治後期莫高窟石窟造像的營建活動鋪墊了道路，成就了吐蕃統治敦煌後期莫高窟石窟造像的新局面。

三、研究內容、方法和意義

第一章以敦煌莫高窟吐蕃時期開鑿的洞窟為考察對象，依據實地調查、田野筆記為基礎，並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著錄，考證吐蕃後期洞窟的數量及其特徵。第二章至第六章以吐蕃後期洞窟中的經變畫為研究對象，從題材、內容、圖像樣式、繪畫技藝的傳承與變化等方面進行討論，力圖呈現出吐蕃後期經變畫的時代特徵。

首先，對吐蕃窟的壁畫構成形式及題材採用分類、排比、組合的方法，找出其演變發展關係；其次，以有紀年的洞窟和典型特徵突出的洞窟為參考，運用美術史的研究方法，對壁畫的局部細節進行分析，探討其出現的背景及年代，為判斷吐蕃後期洞窟的年代提供更為詳細可靠的依據；最後，探討吐蕃時期流行經變畫的藝術形式或藝術風格的變遷及源流，以及民間的信仰特點。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東西方經濟、文化與藝術的交流都在該地區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此地豐富的石窟藝術遺存既是佛教藝術的重要遺產，同時又成為研究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交流往來的重要實物資料。在吐蕃統治時期，吐蕃人向敦煌輸入了吐蕃本土、吐蕃轄地內其它地區的文化與藝術，尤其是在吐蕃後期，這些內容在敦煌莫高窟石窟造像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目前對莫高窟吐蕃窟的研究還不夠完善，對於蕃漢文化交流的程度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本文希望對吐蕃後期這一特殊時段內的石窟經變畫進行研究，通過觀察題材內容、表現形式、風格樣式的發展變化，能夠更深入地認識吐蕃統治時期敦煌一地佛教信仰的特點、蕃漢民族交流往來對佛教藝術產生的影響以及蕃漢佛教藝術之間交流融合的關係。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章 莫高窟吐蕃後期石窟考辨	1
第一節 莫高窟吐蕃時期石窟的分佈狀況	1
第二節 莫高窟吐蕃窟分期研究綜述	2
第三節 莫高窟吐蕃後期石窟考證	6
一、吐蕃窟窟龕形制	6
二、吐蕃窟的壁畫構成形式和題材	10
三、莫高窟吐蕃後期洞窟壁畫的特徵	25
四、小結	55
第二章 吐蕃時期經變畫研究概述	59
第一節 吐蕃時期的經變畫概述	59
第二節 吐蕃時期的經變畫研究綜述	60
第三節 吐蕃後期經變畫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65
第三章 密教菩薩經變研究	69
第一節 密教菩薩經變中的脅侍人物	70
一、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	71
二、功德天與婆藪仙	73
三、內四、外四供養菩薩	76
四、天王	78
五、龍王和忿怒尊	81

第二節 吐蕃時期密教菩薩圖像的源流	84
一、延續漢地傳統的密教菩薩圖像	84
二、外來的密教菩薩圖像	91
第三節 吐蕃時期密教菩薩的信仰特點	94
第四章 金剛經變研究	99
第一節 脅侍菩薩新樣式及其來源	100
一、持金剛杵的金剛手菩薩	100
二、持智劍的文殊菩薩	103
三、持蓮花的觀音菩薩	104
四、脅侍菩薩新樣式的來源	106
第二節 金剛經變故事畫	107
一、法會起緣的因由——舍衛城乞食圖	108
二、修忍行慈——忍辱圖和歌利王本生	110
三、法施勝財施——布施圖	113
四、見塔如見法——供養金剛塔	114
第三節 吐蕃時期的《金剛經》信仰	114
第五章 報恩經變研究	117
第一節 報恩經變故事畫	118
一、序品——婆羅門子孝養父母	118
二、孝養品——須闍提太子本生	118
三、論議品——鹿母夫人本生	122
四、惡友品——善友太子本生	124
第二節 吐蕃時期的報恩信仰	126
第六章 維摩詰經變研究	133
第一節 維摩詰經變故事畫	133
一、經變中的毗耶離城	135
二、佛國品	138
三、菩薩行品	141
四、法供養品	142
第二節 吐蕃時期的維摩詰經變與民間信仰	143
結語——紛繁複雜的淨土世界	147
參考文獻	153
附錄：插圖目錄	161

第一章 莫高窟吐蕃後期石窟考辨

莫高窟長約一公里的崖壁上，保存著吐蕃時期鑿建的洞窟數十個，由於建窟功德記遺失，今天已經難以順利知曉這些洞窟營建的準確年代。有哪些洞窟是吐蕃後期鑿建的？這是一個較難回答的問題。前輩學者關於敦煌石窟考古和藝術的研究已經涉及此問題，並獲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對於吐蕃窟的斷代還存在不同的意見或看法，同時也給吐蕃時期的壁畫研究帶來了一些困擾。爲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吐蕃後期在題材和數量上都大量增加並形成一定規範程序的經變畫，本文將參考前輩學者關於吐蕃窟的分期斷代研究，結合實地考察收集的資料，對吐蕃時期的洞窟進行細緻梳理與考察，找出吐蕃後期洞窟的特點，確定吐蕃後期洞窟的數量。

第一節 莫高窟吐蕃時期石窟的分佈狀況

吐蕃時期營建的洞窟零散地分佈在敦煌莫高窟南區長約 1000 米、高 10～40 米的崖壁上，由北向南可以劃分爲四個區域：

A 區：位於莫高窟南區的最北端。該區域中第 365 窟是 P.4640《吳僧統碑》中記載的吐蕃僧官洪辯修建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龕下的藏文題記記載此窟在 832～834 年間修建完工。（註 1）

B 區：位於北大像北側。一層的吐蕃窟緊鄰盛唐洞窟修建，窟室較小，有的洞窟保存情況較差，它們建成的年代相對較早。當一層崖壁上沒有剩餘空間時，開始選擇在第二層崖壁上營建洞窟，窟室的尺寸較大，第 231 窟是其

〔註 1〕 參見黃文煥：《跋敦煌 365 窟藏文題記》，載《文物》1980 年第 7 期。

中有確切紀年的洞窟，即 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中記載的「報恩君親」窟，陰氏家族的陰嘉政為其亡父母修建的功德窟，此窟在 839 年修建完成。

C 區：位於南北大像之間。南北大像之間的崖壁上早就布滿了隋及唐前期修建的洞窟，崖面上可供建造新洞窟的地方不多，吐蕃窟只好緊鄰隋唐洞窟修建。為了尋求更大的空間建造大型洞窟，一些吐蕃窟建在了南大像北側的第三層崖壁上。

D 區：位於南大像以南。此區域位於南區南端的盡頭，所有洞窟均為盛唐以後修建，但是洞窟沒有按時代相鄰排列，而是根據建窟的需要在這剩餘的開闢之地隨意鑿建，建窟的隨意性給判斷洞窟的建造年代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第二節 莫高窟吐蕃窟分期研究綜述

分期斷代是研究石窟圖像的重要前提。石窟內圖像的題材、風格、藝術特色以及圖像的整體構成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在知曉石窟的營建年代之後，對於研究圖像本身以及隱藏在圖像背後的文化現象有極大的益處，而圖像本身呈現的內容及時代特徵又可以為判斷洞窟年代提供可靠的依據。前輩學者在吐蕃窟的分期斷代研究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以下簡要介紹相關研究的成果及其觀點。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以下簡稱「《總錄》」）中「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部份對莫高窟南區遺存下來的 400 餘個洞窟進行了分期斷代，記錄了各個洞窟的形制、塑繪的內容以及保存狀況，為研究莫高窟石窟藝術提供了基礎資料。（註 2）書中所載史葦湘《關於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一文論及《總錄》分期斷代的方法：在編輯整理內容總錄的過程中，分期斷代和內容考證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關鍵環節，可以利用壁畫的時代考察壁畫的內容，判斷洞窟的年代又可以壁畫的內容為佐證；比較窟室、佛龕的形制與風格，繪塑的特點，造型、暈染和線描的運用，繪畫題材的演變，並參考供養人題記等等，為證實石窟的年代提供參考。《總錄》利用這些方法斷定吐蕃時期修建的洞窟有 46 個，對此後吐蕃窟的研究有很大影響。

〔註 2〕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文物出版社，1996 年。

樊錦詩和趙青蘭的《吐蕃佔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以下簡稱「《分期研究》」）是吐蕃窟分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註3〕}此文在採集的洞窟結構，壁畫的佈局、題材與內容，塑像的組合與內容，造像特徵，供養人服飾，裝飾圖案，龕內屏風畫等等資料的基礎上，以紀年洞窟為標尺，結合文獻資料，按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將資料進行分類排比，並根據文獻資料所反映的歷史背景，結合洞窟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進行分期與年代的研究，由此確定了57個吐蕃窟。並分成早（8世紀80年代至8、9世紀之際）、晚（9世紀初至9世紀40年代）兩期，晚期又分為前後兩段。在吐蕃統治下，敦煌地區的社會狀況確實存在前後時間段的差異，受社會生活各方面影響的佛教造像活動也存在著前後時段的不同，此文將吐蕃窟分為早晚兩期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某些洞窟的年代判斷還有待商榷。

江琳《敦煌中晚唐後壁——龕窟的分期研究》一文，運用考古學類型學的方法考察了中晚唐後壁開龕洞窟主室後壁、左右壁、前壁和龕內三壁壁畫，主要從壁畫佈局和經變佈局方式兩方面進行分析。^{〔註4〕}依據壁畫的典型組合及發展序列把中晚唐後壁——龕窟分為五期，其中第一、二、三期為吐蕃早、中、晚期，最後考證出吐蕃窟20個，此文的結論與以上兩部論著有較大的差異。江琳以壁畫的佈局和組合為重點進行分期研究，力圖從中歸納出中、晚唐洞窟主室壁面佈局的演變規律，但是忽略了洞窟形制的演變和其它壁面的壁畫內容，可以說其分期斷代的標準不完善，而且也沒有注明吐蕃窟早、中兩期的年代。

薄小瑩的文章《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同樣採用了考古類型學的方法，依據各類型裝飾圖案的出現、流行和衰亡的現象，專門對敦煌莫高窟6世紀末至9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進行分期，作者在文中明確指出不能與兼顧諸方面因素的洞窟分期吻合。^{〔註5〕}論文中第八期和第九期即是吐蕃統治時期，對建中二年（782）至大中二年（848）間吐蕃窟的裝飾紋樣的演變、發展及特點有深入的分析，為吐蕃窟的分期斷代研究提供了參考。

〔註3〕 樊錦詩、趙青蘭：《吐蕃佔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註4〕 江琳：《敦煌中晚唐後壁——龕窟的分期研究》，《美術史論》1992年第1期。

〔註5〕 薄小瑩：《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趙青蘭《莫高窟吐蕃時期洞窟龕內屏風畫研究》一文，以《總錄》對洞窟的年代判斷為依據，利用吐蕃時期大量流行的龕內屏風畫對部份洞窟進行分組和分期。^{〔註6〕}在對 28 個吐蕃窟中保存的龕內屏風畫的題材、內容、構圖形式進行討論之後，指出吐蕃時期龕內屏風畫的發展有清晰的序列和明顯特徵，將有龕內屏風畫的洞窟分為四期，文中對吐蕃窟的年代判斷與以上學者的研究結論也有一些差異。趙青蘭僅僅依據龕內屏風畫單一的條件對洞窟進行分期，分期的依據難免顯得不足，其中分期斷代的方法對本選題研究吐蕃窟的年代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相關研究論著中吐蕃窟分期斷代的結論表》歸納了吐蕃窟分期斷代的不同結論（見表 1）。前輩學者的分期斷代研究分別採用了考古學、類型學、文獻學等不同的方法，紀年洞窟第 231 窟是分期研究中的重要參考標尺。江琳、薄小瑩和趙青蘭的文章都是以洞窟中部份壁面的繪畫內容或裝飾紋樣為重點研究對象，分別探討它們發展變化的規律及時代特徵，為吐蕃窟的斷代提供了諸多的參考。但是其中用於分期斷代的條件過於單一，分期年代的劃分也各不相同，未能對吐蕃窟進行全面的考察，因此對一些洞窟年代的判斷存在較大的差異。《分期研究》一文全面地考察了吐蕃時期的洞窟，對分期條件的考慮較為周全，提出分期結論的證據更為充分。文中斷定的吐蕃窟與《總錄》中斷定的吐蕃窟也存在不同意見，較為突出的差異是《總錄》中被確定為晚唐時期的一些洞窟在《分期研究》中被判定為吐蕃窟，分別歸屬於早期或晚期。《分期研究》判定第 111、132、150、181、183、184、190、193、198、470、473 窟為吐蕃早期洞窟，第 143、141、145、147、160、232 窟為吐蕃晚期洞窟，而《總錄》將這些洞窟均判定為晚唐窟。由此可見，吐蕃窟和晚唐窟的斷代存在較大的分歧。

雖然以上論著分期研究各有不同的重點，分期的標準也不完全同，但是對其中一些吐蕃窟的判斷卻是一致的，共同認定的吐蕃窟共 30 個：第 93、112、133、144、151、154、155、157、158、159、191、197、200、201、222、231、237、238、240、358、359、360、361、365、369、447、471、472、474、475 窟。鑒於前人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洞窟的年代進行了考證，並獲得了相同的結論，筆者對此也持贊同意見。筆者在兩次實地考察吐蕃窟的過程

〔註 6〕 趙青蘭：《莫高窟吐蕃時期洞窟龕內屏風畫研究》，《敦煌研究》1994 年第 3 期。

中，除了收集以上吐蕃窟的資料外，還將斷代有爭議的洞窟納入考慮中，採集了壁畫保存情況較好的第 186、141、145、147、232、236、468 窟等 7 個洞窟的基本資料。

表 1 相關研究論著中吐蕃窟分期斷代的結論表

《總錄》中的吐蕃窟	21、92、93、112、133、134、135、144、151、153、154、155、157、158、159、179、186、188、191、197、200、201、202、222、231、236、237、238、240、258、357、358、359、360、361、365、369、370、447、468、469、471、472、474、475、478、479			
《吐蕃佔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	早期：8 世紀 80 年代至 8、9 世紀之際		晚期：9 世紀初至 9 世紀 40 年代	
	81、93、111、112、132、133、150、151、154、155、181、183、184、190、191、193、197、198、200、201、222、224、447、470、471、472、473、474、475		前 段 136、141、142、143、144、145、147、157、158、159、160、231、232、235、237、238、240、360、363、365、367、368、369、468	後 段 7、358、359、361
《敦煌中晚唐後壁——龕窟的分期研究》	第一期 早期	第二期 中期	第三期 晚期	
	93、188、197、202、222、370	154、201、236、200、358	359、361、240、159、237、231、238、112、367	
《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	建中二年（781）至開成四年（839）		開成四年（839）至大中元年（848）	
	144、157、186、222、231、236、237、238、360、197、369、116、134、135、358、225、384、185、218、386、126、129、188、155、158、191、365、447、475		154、159、201、226、370、180、358	
《莫高窟吐蕃時期洞窟龕內屏風畫研究》	第一期 8 世紀 8、90 年代前後	第二期長慶會盟（821 年）前後	第三期長慶會盟前後至 9 世紀 30 年代	第四期 9 世紀 30、40 年代
	134、135、144、468、153、154、155、222、226	447、93、471、474、475、112、159	7、369、359、361、360、358	231、238、237、236、240、258

本文對吐蕃後期洞窟的考察研究將從以上已經確定的吐蕃窟出發，結合實地考察收集的信息，通過對窟龕形制、壁面壁畫的佈局和題材等基礎資料進行分類、組合，分析、比對，從中劃分出吐蕃後期洞窟以及可以作為判斷吐蕃後期洞窟的標型窟，分析吐蕃後期洞窟的特點，同時考證斷代有爭議的洞窟的營建年代，確定吐蕃後期洞窟的數量。